良渚文化玉器鉴赏

中华礼制文明的先河

方向明

图1

图9

图8

图5

图6

公元前3300–2300年的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中心所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是东亚地区最早迈入早期国家形态的区域文明，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实证地之一。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良渚文化是崇玉、用玉的文明，透闪石软玉已成为当时用玉的主流，切割、管钻、微雕、抛光等琢玉工艺技术也已经完全成熟，良渚社会有着普遍信仰的神像，形成了以琮、璧、钺和复杂头饰等为代表的一套成组玉礼器系统，开启了中华礼制文明的先河。结合出土场景并根据器物形制和纹样，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可分为置放在棺盖上的礼仪用玉、反映神权的琮和衍生的琮式玉器、反映王权的玉钺和豪华权杖、发展为财富观念的璧、礼仪服饰用玉、礼仪工具用玉等六大类。

图2

置放在棺盖上的礼仪用玉

良渚墓葬多采用舟形的独木棺，盖棺后在棺盖上置放特别形制的玉器，是高等级墓主人航行到另外一个新世界的重要仪式，往往3件一组等距离置放在棺盖上，种类有环镯、柱形器等，如瑶山M7的3件环镯和反山M20的3件琮式柱形器等(**图1**)。

反映神权的琮和衍生的琮式玉器

琮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琮的核心元素是神像，神人和兽面有机结合的神像既是太阳神，也是良渚社会的祖神。良渚琮可分为镯式圆琮、矮方琮、高体型多节琮三类，良渚琮功能较为复杂，作为臂穿、放置于头侧、放置身体一侧，甚至作为特别器座插放豪华权杖等。良渚琮的基本形制和要素包括圆形外廓、四角、分割四角的直槽、中间贯穿的射孔，以及四角以整体展开法展示的神像图案和二方连续的四角图像。良渚琮都刻意雕琢为上大下小的形制，关于良渚琮的解构，可以视上下的圆形射面为天地，节面和直槽为方位和通道，贯穿上下的射孔为可以旋转的中轴，如此复杂的几何形式就是良渚社会宇宙观的模型和写照(**图2**)。此外，琮的形式还被雕琢在锥形器、柱形器上，还有一类管状小型琮，称之为小琮或琮式管。

反映王权的玉钺和豪华权杖

斧钺是“王”字的本形，生产工具或武器礼仪化的代表——玉钺的产生，可作为礼制出现的指示器。距今约6000年的金坛三星村出土两套组装骨牙质瑁镦的豪华石钺，说明这一时期礼仪性的石钺已经出现。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开始出现玉质的斧钺，良渚文化玉石钺成为男性性别的标识，不同材质和不同形制的石钺有等级之分，玉钺的有无以及是否组装玉质的瑁镦更成为身份等级和地位的象征。瑶山M7玉钺杖刻纹玉瑁镦的构型如同纵向对折的象征神像冠帽的玉冠状器，反山M12大玉钺本体两面雕琢神像和神鸟，是王权神授的直接彰显。反山M12还出土了装配玉瑁镦的豪华权杖，通体雕琢神像等纹样(**图3**)，并以玉琮作为器座。2010年上海福泉山吴家场墓地良渚文化晚期M207，出土了一对通长约79厘米的象牙权杖，杖体雕琢十组错落布列的神像，权杖的基本形制与反山所出完全一致，说明除了玉钺杖之外，还存在另一类的豪华权杖。

除此，良渚高等级墓葬中还有各种形式的其他权杖玉端饰，一些存在形制上的共性，一些则独一无二，这些权杖具体性质不明，考虑到良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不同形式的权杖极可能是墓主身份的反映。

发展为财富观念的璧

璧环类玉器早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中就开始出现，尤其是凌家滩文化的璧环，有通过线锼形成的双重璧环、锯齿状璧环等多种形式，寓意着对于太阳的崇拜和天地的观察，但这一阶段璧环形体都较小，良渚文化璧从小型璧环(包括“圆牌”)向大孔璧环(所谓“瑗”)发展至最后定型。反山是迄今出土璧数量最多的墓地，共130件，其中M23出土54件，是迄今为止出土玉璧数量最多的良渚墓葬。反山M20：186璧(**图4**)，品质和工艺最为精美，璧的宽度(所谓“肉”)和璧的穿孔(所谓“好”)之比为3.6：1，成为良渚文化璧的黄金比例。良渚高等级墓葬中制作稍粗糙的璧往往呈堆叠状位于脚端部位，一些考古学家推测这类可能是“财富”的象征物，当然也是玉礼制的内容之一。

礼仪服饰等用玉

礼仪服饰用玉包括头饰、项饰、胸饰、臂穿、带钩和各种形式的穿缀玉器。头饰如冠状器以及仅男性显贵使用的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成组半圆形器等。项饰除了管串和珠串，主要是女性显贵佩戴的璜、成组圆牌等各类原始组佩。

良渚冠状器顶部和外形多直接取之于神像的介字形冠帽。反山M16、M15冠状器利用透雕和阴线刻划相结合的技法展现神像，反山M15冠状器构型的顶部凸起呈台形，与良渚晚期玉器上的台形铭刻图符以及好川文化台形镶嵌玉片形制颇为接近。

三叉形器通过端部的贯孔镶插簪体，均作为墓主束发后的插件。三叉形器仅见于良渚古城及周边区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三叉形器的上端往往有一根玉管与之配伍，这样可使得中叉的长度大大延伸(**图5**)。已知配伍三叉形器的最长玉管出自反山M17，长达12.48厘米，与中叉组装后整器可高达15.3厘米。

锥形器的原型源自箭镞和投矛，单体的锥形器在墓内出土位置多样，尾端常有玉套管配置(**图6**)。成组锥形器则均位于墓主头部，共同组成冠饰，主要分布于良渚古城及周边区域，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成组锥形器多为奇数，或硕长或雕琢琮式图案，一组11、9、7、5、3件不等，等级鲜明。

成组半圆形器4件一组，正面弧凸，背面凹弧且有缝缀隧孔，出土时呈圆周状分布于墓主的头部，仅见于反山、瑶山墓地等级最高的墓葬，堪称“王冠”。

以璜、成组圆牌为主体组佩为女性显贵专有，分为颈饰和胸饰。八千年前的萧山跨湖桥3件璜形器可能是璜的祖型，璜盛行六、七千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繁荣于五、六千年前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早期，良渚文化中晚期随着男性威权地位的绝对确立，璜和成组圆牌就迅速退出良渚玉礼器的舞台。瑶山M11墓主颈部3件璜，胸部12件成组圆牌，很可能组合串系，颇具周代组佩的雏形。

臂穿分为腕饰和臂饰，除了少量条状环镯外，多器身较高的筒形，外壁还往往微微内凹，应具有形体和视觉观看上的特别要求。带钩(**图7**)数量不多，出土位置多在墓主下肢部位，可能作为裹尸时的缚扎。

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穿缀玉器，除了鸟、蝉、龟、鱼等神灵类动物外，还有月牙形、椭圆形、半管形等特殊造型。瑶山M11成组椭圆形缝缀玉器，极有可能是蝉等的简化造型。新近良渚古城遗址南部北村M106出土刻划羽线纹的振翅玉蝉(**图8**)，与反山M14蛹状玉蝉相得益彰。

礼仪工具用玉

包括一些源自于工具和日常用品的玉器具，如纺轮、织机、刀柄、把手，以及嵌玉容器类器具、匕匙箸类食具等，一些器具上还雕琢神像，如瑶山M12出土的玉匕(**图9**)。实用器具的玉礼化，也是良渚玉礼器的重要内容。反山M12：68嵌玉圆形器(**图10**)，复原外径约28厘米，中间为圆形大玉片，外周分别镶嵌光芒形、梅花形的玉粒，颇似“太阳盘”。

作为镶嵌工艺的嵌玉漆器，把大量细小的无孔玉粒及某些捉手、圈足之类的玉件，结合髹漆装饰在有机质的器具上，既可称为漆器，也可认作嵌玉髹漆的玉器，可辨的有嵌玉漆觚、嵌玉漆壶、嵌玉圆形器等。良渚嵌玉髹漆工艺有效地克服了玉料及剖割技能的局限，使得个体较小的单体玉件，在空间上得到充分的伸展，成为商周时期以器表装饰凹凸不平纹样为特征的青铜礼器中容器的直接前身之一，大大提前了我国镶嵌工艺的历史。

良渚文化玉礼器在中国史前玉器中独树一帜，无论是辨玉识玉、雕琢工艺，还是成组配伍，都是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以大量玉礼器随葬的良渚文化大墓，集中体现了王者的高贵以及男女贵族的分工，有序控制了社会政权组织和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良渚社会开创了以玉礼器系统的礼制秩序和依此体现王权神授的统治理念，是中华玉礼制的先河，也为中华文明起源和演进奠定了基础。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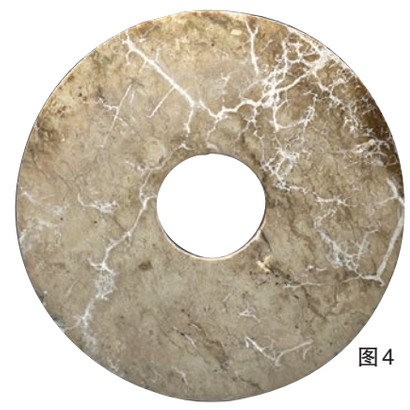
图4

图7

图10

玉觚的“前世”与“今生”

张琳

“梦蝶斋徒曰：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解之者亿不得一。”梦蝶斋徒是明代文人张谦德的别号，他在《瓶花谱》中说，避世隐居时有众多闲雅逸事，其中瓶花之道最难使人领悟，能深谙其道者寥寥无几。可见，在一众闲雅之事中，瓶花之道颇为古奥、精微，最是“细微处见真章”。

“凡插贮花，先须择瓶”，在张谦德《瓶花谱》中，春夏秋冬插花所用的容器皆有不同，想要花与器相得益彰，每个季节都要选择不同的瓶壶。在众多不同材质的插花容器中，玉质花觚以其特有的温润、细腻脱颖而出。不论是灿烂的迎春、杜鹃，或是淡雅的秋菊、冬梅，束起几支插入光洁细腻又素雅清淡的玉花觚中，总能将瓶中花映衬得更加娇俏可人。

但“觚”这一器具，在出现之初，并非是作为插花用具。觚原为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酒器，也做祭祀用器，后世演进到玉觚时，才逐渐演变成为插花器、书房陈设品。

早在新石器时代，陶觚就已经出现。早期陶觚器身多粗矮，口部微敞，杯身自口部至底部为弧形，或完全呈筒状，纹饰一般相对较少，样貌十分朴素。发展到中期，陶觚在造型上进行了一次“升级换代”，此时整体上从粗矮变至细长，纹饰由最初的素面或是锥刺纹发展到平行弦纹和平行凸棱组合，甚至有了技术要求较高的镂空纹饰。晚期陶觚的造型回归，告别复杂多样的纹饰，再次以素面和泥丁纹为主，数量也急剧减少，后来逐渐被商代盛行的青铜觚取代。

青铜觚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此类铜器出土数量较多、分布范围较广。青铜觚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盛行于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时期，在西周早期逐渐衰退，进而消失。《说文》载：“觚，乡饮酒之爵也。”段玉裁注：“乡，亦当作礼。”觚为礼器中饮酒的器具。觚爵组合是商周青铜礼器中最基本的组合之一，亦是酒礼器制度的核心。商代早期铜觚的腹部相对粗矮，觚口外侈程度不大，符合饮器的特征。商代晚期出现了高体细腰、壁厚体重、觚口外侈程度大且外翻的铜觚，这类铜觚失去了饮酒功能，表现出明显的礼器特征。

除了陶觚、青铜觚，木觚、瓷觚等也出现在玉觚之前。这些不同材质的觚形器在不同时代登场，或为礼器，或为酒器，或为陈设用器，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意义。

玉觚的出现，最早能追溯到明代，明代雕漆及其他工艺品中经常出现使用花觚的图案，或作为博古题材的装饰，或与香炉共同陈设于桌几之上。此时的玉质觚大多不再作为酒器、礼器，而主要作为玉陈设或是插花器。

明代的玉觚大多以青白玉为主，多数造型近似于方柱形，口、足外撇，中部呈方形，由于口内要用来插放器物，所以口部外撇，中部较粗，表面打磨光滑。清代玉觚较明代玉觚有很大发展，乾隆皇帝收复新疆，大批和田玉流入内地，因此清代玉觚一般用料较好，色彩也较丰富，所见碧玉、黄玉、白玉觚都是明代未有的。

清代玉觚的装饰图案很多样，常见的有福寿纹、蟠螭纹、兽面纹等等寓有福寿、吉祥之意的图案，其中蟠螭纹较为少见，觚上附有凸起的蟠龙，大多为皇家所用玉器。例如这件山东博物馆藏青玉蟠螭花觚(**图1**)，器上、下均饰一立体蟠龙，中部雕有吉祥云纹，整器玉质莹润无杂质，白玉材质，线条光滑，表面莹洁，皇家玉器的精致、华贵都寓于一器之中。

另一件清仿古青玉花觚(**图2**)，整器玉质莹润，呈青色，局部有沁斑。方体器型，分三段，上下两段中空，中段实心，器上纹样采用回纹、兽面纹。回纹的构成形式是由线条进行横竖转折，状似“回”字的形态。回纹有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寓意为“富贵不断头”“福贵长存留”等。兽面纹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典型纹饰之一。兽面纹常装饰在觚的中段，是最常用的玉觚纹饰，琢制较精致，多带锦地，眉、眼、嘴、鼻微凸起，眉部及嘴侧带有云状的装饰纹样。

从产生之初的酒器、礼器，到后来的插花器、陈设器，随着朝代更替，觚的材质、造型各有特点，蕴含其中的历史、社会意义也大不相同。兴起于明代，在清代发展至顶峰，玉觚以其细致的雕刻、精美的纹饰，记录着明清手工匠人精湛的技艺。“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不论是陈设器，或是插花器，一座座莹润光洁、照映花色的玉觚，也蕴藏着明清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追求。

(山东博物馆/图)

图1

图2

国博馆藏银鞘佩刀

杨旭

银鞘佩刀 中国国家博物馆

19世纪阿拉伯赛夫佩刀 《世界冷兵器探微》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把银鞘佩刀。根据文字说明，这把佩刀为1974年11月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现也门共和国)总统委员会萨勒姆·鲁巴伊·阿里赠毛泽东同志的银鞘佩刀。

从形制上看，这把银鞘佩刀应该属于一把典型的阿拉伯赛夫。赛夫(ڤيسلا)翻译自阿拉伯语，本意为刀(剑)，广义上可以说是大范畴舍施尔弯刀的一种。Saif一词泛指阿拉伯的刀剑，阿拉伯地区使用的刀剑都可称为赛夫，因此随各种类的特征和材质，名称也有所不同，比如材质为钢的称为Saif Anit；钢铁的则称Saif Furad；刀身铁制，但锋刃由钢铁打制的则称为Saif Mudakkar。

狭义的赛夫整体形制与舍施尔类似，且都是单手握持。主要区别在于细节：第一，赛夫弯曲度相对较小和平缓。第二，赛夫多数有血槽，而且刀身等宽，而舍施尔大多不安血槽，且刀身一般尖头收窄。第三是刀柄头形状，舍施尔是经典“L”型手枪状，简洁利落。而赛夫柄头更大，形状更复杂，有的呈钩首状，有非洲风格影响印记。此外，部分刀柄有护手，为由护手连接到柄头的条状物。

从本文佩刀看，由于条件所限，看不到这把佩刀的出鞘形态，第二个判断依据很难验证。但第一和第三点特征均比较明显，这把佩刀较为平缓的曲线，较宽且均长的刀身，钩首状的较大柄头，都说明这是一件典型的(南)阿拉伯赛夫。

由于阿拉伯半岛中南部地区较其他地区手工业要落后，本身难以锻造出非常精美的武器，因此该地区阿拉伯部落除自行生产外，不少向波斯和叙利亚及土耳其乃至欧洲地区购买刀条，自行拼装。所以有种说法，阿拉伯半岛刀剑(广义上的赛夫)多为装饰性，刀身不足论，唯刀装有所可取，此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件佩刀贵为两国最高领导人间的国礼，相信其刀身质量也定为赛夫中的上品，仅通过其外装，就能一见端倪。此刀柄和刀鞘均为银装，覆银做工精湛。

通过刀柄形制，赛夫可以区分为北阿拉伯沙特式和南阿拉伯阿曼式。北阿拉伯式由于接近波斯文化圈，其刀柄与波斯舍施尔比较接近，呈现出一个九十度左右的拐点，棱角分明。南阿拉伯地区由于与红海和亚丁湾等非洲国家接触更多，体现出一定的非洲风格。当地赛夫末端拐点会显得庞大不少，更接近于非洲地区常见的尼姆察刀。总体而言，阿拉伯世界的赛夫在刀身上的装饰普遍逊色于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地区，主要装饰方式以铁雕居多，错金工艺相对少见。

这把银鞘佩刀刀鞘上固定两个吊环，可将赛夫悬挂佩带于身前。其刀身相对宽阔，带有弯曲状刀首，形似三个小爪子。整个刀鞘运用了铁雕和炸珠工艺，精美錾刻了传统伊斯兰植物与几何纹饰。其中植物纹主要是几种卷草纹。另外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把刀的十字护格两个尖端处相比舍施尔明显圆钝，类似瓜楞形状。在护手末端的钩处也有一个瓜楞顶。这可能也是赛夫装饰细节的一个小特点。整把银鞘佩刀有一种古朴之美，沉郁中不乏精致，看似朴素的外表遮盖不住其内在的光芒。整体用料考究，做工细致，不愧为一把国礼级别的古董级赛夫。